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胞的生物特征研究

印朗川¹ 李伯华² 刘沛林³ 宁东阁⁴¹

(1. 湖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中国湖南 长沙 410081;

2. 衡阳师范学院 地理与旅游学院, 中国湖南 衡阳 421002;

3. 长沙学院 乡村振兴研究院, 中国湖南 长沙 410022;

4. 圣伊斯特万大学 风景园林与城市规划学院, 匈牙利 布达佩斯 1118)

【摘要】:“景观基因胞”概念原指传统城镇景观的基本单元,是对有机体细胞的类比,所有聚落建筑、构筑物其实都可以看成型态、功能不一的细胞单元,它们共同协作构成聚落文化景观有机整体。文章延续这一概念,并继续与生物细胞的生物学特征进行类比。研究认为,景观基因胞具有如下生物学特征:代谢活动;增殖与凋亡;遗传与变异。其中,代谢活动包括空间代谢、物质代谢与功能代谢,遗传方式包括胞扩散、胞变异与胞恒定三种方式。最后,文章选取湘东北及湘东南三个传统聚落——张谷英村、中田村以及上甘棠村,对景观基因胞生物学特征的表达方式进行案例诠释。

【关键词】: 传统聚落 景观基因 基因胞 生物学 空间代谢 生命历程 特征

【中图分类号】: K901.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 (2022) 03-0182-08

生物学概念及理论运用至地理学与相关研究早已有之,如大地有机、生存空间、文化进化、聚落形态、蜂巢模型、元胞自动机等^[1,2,3,4,5]。而对于聚落景观研究,其生物特征在地理学、人居环境学以及建筑学等学科中也均有认同,如将聚落比拟为独特的、复杂的生物个体^[6,7],或是进化中的有机体^[8],以及将聚落地方性特征比拟为景观基因和基因组^[9,10]等。在地理学思想发展中,聚落已包涵生物个体、细胞以及基因三种层次的特征与属性,还有如形态周期、有机更新、有机秩序、人居环境演化均表现出“聚落—类生命系统”的生命周期性、系统复杂性等特征^[11,12,13,14],而且相关论述具有普遍性。

传统聚落长期是人类聚落主要的存在方式,国内传统农耕聚落具有悠久深刻的历史社会及自然环境背景,具有如下典型特征:土地稀缺、繁殖扩展、协同合作、适应环境。全新世以来气候波动起伏,“黑河—腾冲线”以东地形复杂、河流纵横,人口迁徙(核心区向边缘区)以及治水文化贯穿华夏历史,而与之适应的“家庭主义”(集体主义)先天带有“中心性”特征,并逐渐演化为“血缘”与“地缘”的社会基本关系,以及家国伦理的儒家思想^[15,16,17]。文化景观是由一组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而产生

作者简介: 印朗川(1988—),男,湖南桃源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传统村镇保护与规划。E-mail:yinlangchuan@163.com;刘沛林(1963—),男,湖南汉寿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化地理、聚落地理、景观规划及人居环境学等。E-mail:liu_peilin@126.com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195、42171215);长沙市重大科技专项项目(kq2011002);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1JJ30062);湖南省人居环境学研究基地开放基金项目(RJ19K01);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190389)

生的^[18]。而东方“家庭主义”血缘性的社会关系也必然在广大聚落景观中映射，聚族而居的代表性景观表征有“宗祠”“场屋”“围屋”等。血缘性其本质依旧是生物性，其显著特征为传承性与扩展性，因而在社会性与文化性上，多处于半封闭状态的南方传统农耕聚落，其生物“遗传”特征应是显著的。营造活动也表现出“集体无意识”状态^[19]，是历时性的经验与文化适应的结果。

“景观基因胞”概念原指传统城镇景观的基本单元^[20]，是对有机体细胞的类比，所有聚落建筑、构筑物其实都可以看成型态、功能不一的细胞单元，它们共同协作构成聚落文化景观有机整体。本研究从景观基因胞切入来探讨传统聚落的生物学特征，有如下考虑：景观基因胞是聚落景观的物质构成单元；景观基因胞是聚落遗传信息的主要载体；景观基因胞是具有活性的，具有相对独立的、有序的代谢体系。类比与归纳聚落景观的“胞”生物学特征有助于从微观视阈认识聚落的类生命特征，以及其演化的自然规律性，也是对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理论的有益补充。同时，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构成，对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胞”类生物学特征的诠释，也是对物质文化单元载体的特征及规律性进行描述与解释，本研究的延伸将有助于推进传统文化景观的有序传承与革新。

1 相关概念

1.1 生物细胞

细胞是各种活体组织的通用建筑组件，是有机体生长与发育的基础。细胞英文“Cell”原本就具有房间的涵义，也与细胞最初被发现所呈现的形态相关。目前生物科学的观点，一切现代细胞都是由同一祖先进化而来，它包含了地球一切生命所通用机制的原型，通过突变，逐渐趋异，形成多样的生命形式^[21]。大致可通过细胞的结构、代谢、增殖、突变、遗传以及凋亡过程来认识细胞的生命活动。

①细胞结构。以动物细胞为例，细胞由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线粒体、内质网、溶酶体、核糖体、高尔基体等部件构成，各部件协作形成相对独立与稳定的内环境。

②细胞代谢。细胞代谢是指细胞内所发生的用于维持生命的一系列有序的化学反应的总称。细胞生命活动以物质代谢为基础，以能量代谢为动力，以信息调控为基础。代谢过程使得生命体能够生长和繁殖，保持结构以及对外界环境做出反应。

③细胞增殖。细胞都采用一分为二的分裂方式进行增殖，细胞增殖是生物体生长、发育、繁殖以及遗传的基础。

④突变与遗传。突变是指细胞的遗传物质 DNA 基因组发生改变。有些突变是可以遗传给后代的，称之为可遗传的变异，而生物的进化则以这种可遗传的变异为基础，产生新的适应性群体。

⑤细胞凋亡。细胞凋亡是为维持内环境稳定，主动由基因控制的自主死亡。细胞凋亡的生物学目的是清除不需要的细胞，保持个体发育的正常进行。

1.2 景观基因胞

聚落景观是历史过程与时间序列所叠加的结果^[22]，正如环境与行为研究学者阿摩斯·拉普卜特（Amos Rapoport）所说，“文化景观只能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集体无意识地生活体验和无数干预自然的决策而累积起来的”^[23]。传统聚落所在的乡村基层市场（集市）区域，其文化单元具有相对封闭性，框定了大部分传统聚落居民的主要活动范围^[24]。对于南方聚落而言，文化交流上的相对封闭性又往往与地理环境的自然隔离有关，这就使得传统聚落景观具有某种独特性与地方性特征。

这些蕴含地方符号的相对稳定的文化景观特征，构成了文化景观遗传的基础，即景观基因^[26]。景观基因“胞”源于景观基因理论中对聚落景观基本结构的“胞—链—形”图解，是文化景观基因信息的物质载体，是凝聚了传统聚落社会文化意识、技术以及劳动实践的基本物质景观单元。

本研究对“胞”的内涵进行拓展，基因胞也囊括“链”——交通网络的范畴，以及如“半月形”风水池等的形态类型，因遗传信息选择性表达差异，分化成形态与功能不同的基因胞类型。传统聚落的景观基因胞大致可以分为住宅类、庙寺类、娱乐类、休憩类、文教类、交通类、防御类、风水类等类型，它们彼此联系，构成了传统聚落社区群体日常的生活空间。

在本文中，主要以占绝大多数比例的住宅“基因胞”来阐述其类生物学特征，具体可从代谢活动、增殖与凋亡，以及遗传与变异三个主要方面来进行说明。

2 景观基因胞的生物学特征

2.1 代谢活动

景观基因胞的代谢活动与细胞代谢目的一致，都是为了维持景观单元（个体）结构与功能的正常运行，抵抗自身熵增的过程^[26]。而参与这一过程的，同样是物质代谢、能量代谢与信息调控三个基本系统。其产生的结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物质代谢、功能代谢及空间代谢（图1）。

物质代谢对于以梁架木结构为主的东方建筑及构筑物而言是必需的，如柱子、屋面、台基、墙体以及油饰彩画等都是容易受到损毁的部位^[27]，而重建也常发生在诸如祠堂、庙宇、道路、桥梁等公共建筑或构造物上。景观基因胞的物质代谢除了包涵对景观基因胞的修复与重建过程外，还包括为适应家庭、技术、社会变化的更新情景。其发生过程既可能是由外至内的材料与符号更迭，也可能是由内至外的功能与服务提升，但基因胞的建筑骨架与空间逻辑并未发生质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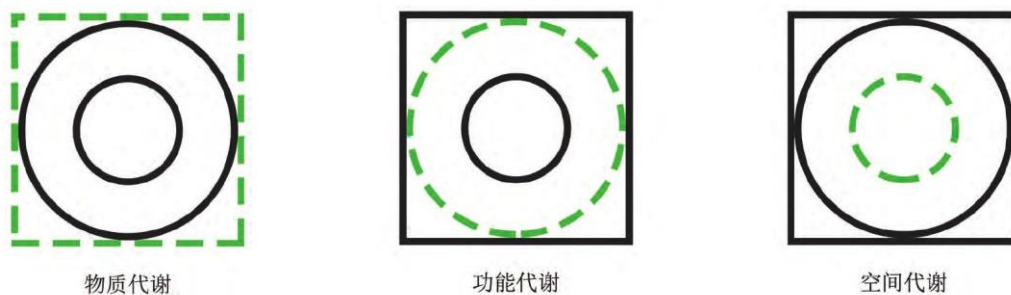
功能代谢是指景观基因胞的功能发生变化与更迭，并可能与物质代谢同时发生。这个变化也可能是反复的，或者说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胞的某些类型自身就带有功能的灵活性。如湖南浏阳楚东村的“锦绶堂”，自建成百年经历居住、行政中心以及重点文物保护的功能变迁。物质与功能代谢是景观基因胞的适应性调整，代谢过程也容易发生衍化^[28]，并促成基因胞变异的产生。

空间代谢是景观基因胞的日常代谢活动，是调整因自然因素以及人为活动等造成的熵增现象的持续能量输入过程。例如，热辐射过程、给排水过程、通风过程以及劳动干预的清理过程等。传统建筑在空间的组织与建造上，多有考虑其日常活力的维持，力图保持与周边环境的平衡，即从选址到房屋功能布局均有经验依据与习俗规范^[29]。

2.2 增殖与凋亡

景观基因胞的增殖是指因为家庭规模、经济规模等要素发生变化，某类型基因胞经复制后数量增多的现象。景观基因胞的增殖属于发生学范畴，即增殖过程有同源性，基于血缘或地缘，其过程与人口变化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在聚落内部的人口增殖及迁徙扩展，并可能刺激其他同类胞体的模仿，并不断迭代进化。

基因胞增殖既是人口再生产的过程，也是空间再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景观遗传物质再传承的过程。景观基因胞的增殖与遗传是同时发生的，基因胞可以通过增殖方式实现基因信息的遗传与扩散过程，这与细胞的增殖并无明显差异。遗传信息与景观基因胞载体是共生的，尽管这种历史情景随着数字化与虚拟化的实现^[30]，文化符号遗传信息可从原有载体剥离。



景观基因胞原型：为正方形与圆形的组合。方形代表“大地方形”思想指导下建筑物或构筑物所呈现的形态特征；圆形指代建筑物或构筑物因人的活动安排所具有的生命活力特征，其中大圆指代建筑物或构筑物人为界定的空间功能，小圆则指代空间活力。

绿色虚线：表示代谢过程发生的界面，物质、功能及空间都是不断变化的。其中，物质代谢主要发生于建筑构件的更新上（虚线方形），功能代谢主要发生在空间功能的演变上（虚线大圆），空间代谢则主要表现在基于人感知的空间活力上（虚线小圆）。

图1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胞的代谢活动

景观基因胞凋亡是指景观基因胞的遗传信息与载体的湮灭，在历史景观演变过程中，类似于程序性死亡，凋亡在并不追求建筑物长存的传统文化下是常见的。文化景观更迭与生物演化雷同，而其发生的微观场所就在景观基因胞，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胞在当代界面存在传统需求减退与当代需求变革间的矛盾作用力，若无逆向干预，自然走向凋亡，现存较好的传统聚落往往处于矛盾相对缓和的局部环境中^[31]。

凋亡难以避免，比较理想的情景，或非阻止景观基因胞的凋亡，而是促成其再生与进化，以实现传统聚落生活景观的整体适应性调整与活力再生，此点也类同细胞凋亡在生物学上的意义。

2.3 遗传与变异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胞的遗传机制与细胞的二分裂方式存在差异，是指景观基因胞遗传信息在时空界面的长久存在机制。景观基因胞遗传方式有三种：胞扩散、胞变异与胞恒定。景观基因胞遗传表达方式与分家式的家庭制度、历史社会环境，以及基因胞类型等有关。

胞扩散是文化扩散的现象之一，包括迁移扩散与扩展扩散，但这种扩散往往会受到地域影响与限制，因而具有显著的地方性与区域性特征^[32]。比较直观的情况是自然村落的增殖过程，相似的思想观念、技术系统与经济基础，使得某区域自然村落往往风貌和谐统一、连贯成片，如在湘南地区，汉族住宅基因胞被当地瑶族广泛接受等。

胞变异是指某景观基因胞类型，在时空蔓延过程中，形成共时性变体与历时性变体的过程，即类型的地域性演变与历史性演进^[33]，胞变异与胞扩散往往同时发生。如源于北方的“四合院”经时空适应性演变，变异为多类型合院式建筑^[10]，如“四水归堂”式的皖南民居、“一颗印”式的云南彝族民居等。景观基因胞类型的变异即使在同一聚落也是可察觉与辨识的，如南方聚落常见的“一”字型、“L”型以及“凹”字型、“H”型的悬山顶穿斗式多开间民宅，其原型应是符合传统礼制的独栋正堂三开间民宅。

胞恒定并非严格的遗传现象，但是此类基因胞往往多次重建，以公共信仰体系地方建筑或构筑物为主，如文峰塔、风水池、文昌阁、土地庙、祠堂等，符号体系相对恒定，构成地方集体共同记忆、情感与观念，是传统聚落景观较为恒定的部分，是特殊

的景观遗传方式，如上甘棠村始建于明万历四十八年的文昌阁，至今依旧巍然屹立。

3 景观基因胞生物学特征的案例研究

3.1 研究区域及案例

本研究的案例选取自湘东北及湘东南区域。此区域始于南岭，终于洞庭，以湘江与洞庭湖为主轴，支流密布，跨越约 4.5 个纬度。区域边缘多山岭，东有罗霄山脉，南有南岭横贯，西有越城岭、雪峰山支脉，腹地多丘陵、河谷平原。以汉族聚落为主，少数民族（瑶族）村寨多见于郴永山地。随中原汉文化沿洞庭东西两侧及湘江流域不断向南渗透，区域开发有南北快慢之别，中下游地区平原地区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与文化积累，而南部多山地，中原与荆楚文化在此与古越族文化杂合共生^[34,35]，后明清时期湘楚经历人口自东向西大迁徙，其中以赣文化、客家文化影响为盛^[36]。因而，可以大致将此区域看成是中原汉文化先南北纵向延伸，后从东部平行渗入的文化带，整体上文化景观基因胞具有连贯性与相似性，湘东南景观则具有潜在滞后性，这有助于分析基因胞的扩散与分异现象。根据建村历程、宗族单一性、村落风貌等典型特征，本研究从北至南选取张谷英、中田以及上甘棠村 3 个明清风貌传统聚落作为研究案例（图 2），3 个村落都是远道迁徙而来，定居繁衍的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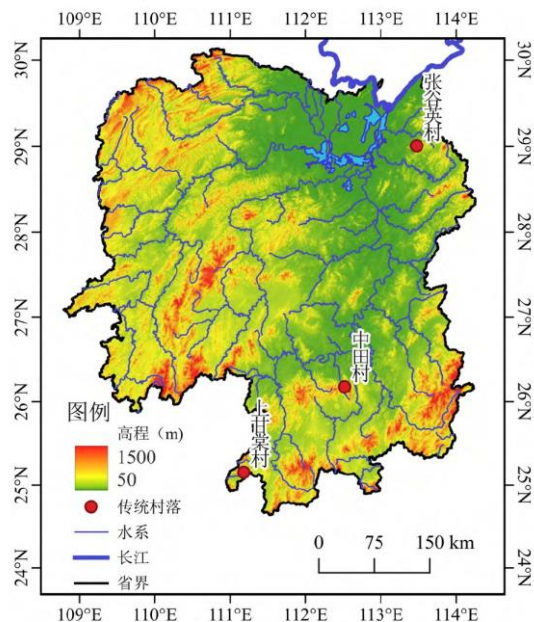


图 2 研究区域及案例点分布

①张谷英村。张谷英村位于幕阜山脉余脉渭洞盆地中，有渭溪河与玉带河穿村而过。始迁祖张谷英于明洪武四年（1372 年），沿幕阜山脉自江西入湖南，迁居至此地，至今已 600 余年。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 年），八世祖张伏层从石桥冲旧居迁至渭洞张谷英村现址，在东南端始建“当大门”建筑群落，清朝嘉庆七年（1802 年），十六世祖张续栋沿渭溪河北上不远建第二代屋“王家墩”，清朝嘉庆八年（1803 年），张续栋兄张续彬在西北端建“上新屋”聚居点。各建筑群呈“干支式”结构，内部住宅单元以天井为中心，自成庭院，多庭院组合，贯为一体。

②中田村。中田村位于常宁庙前古镇北侧谷地，背倚翠微峰，前有月光塘，左有谭水河绕村而过。始祖福五郎，祖籍陕西，原籍江西吉安，由茶陵调守桂阳，明朝永乐二年（1404 年）择居于此。李氏经长子繁衍，清中期达到鼎盛，因处于多战乱之地，民风崇文尚武，遂成军事防御型聚落。如今，明清古建筑群坐南朝北，规划整齐，砖木结构，硬山顶，“金字屋”形制，无檐无

廊，民居围合，似穹子屋^[37]。

③上甘棠村。上甘棠村位于都庞岭与玉屏山脉间，为山地丘陵地貌。古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前有案山，是典型的传统风水聚落。村西南侧始建于宋代的文昌阁与村东北边的昂山一实一虚，以谢沐河为阴阳线，使得古村呈现太极八卦格局^[38]。周氏族人祖籍山东，逐渐南迁，其中一脉于唐代（806—820 年）从宁远大阳洞迁至上甘棠村定居，繁衍至今。上甘棠村从唐代里仿制布局演化成中原文化庭院式院落^[39]，以邻河街道为主轴线，巷道干支式布局向内侧连通居住建筑群。

3.2 案例分析

3.2.1 基因胞的生命历程

基因胞的生命历程意指基因胞个体在时空范围内存在的过程。景观被认为是某种连续过程，而非完结的形式^[40]，因而，景观基因胞自身及周边都处于变化之中，景观基因胞的代谢过程与凋亡过程都可以纳入基因胞的生命周期中。基因胞的生命历程包括出现、代谢、衰老、凋亡与可能的再生（重建）五个阶段。

基因胞群体生命历程，可能处于“连续占据”的某个演替界面。在当代语境下讨论传统聚落的消亡过程与保护紧迫性，与传统聚落景观所处的快速更替界面有关。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胞存在被新出现的基因胞“吞噬”的压力，而这些基因胞的出现，并不能视为原有基因胞的重建或变异现象。外部现代文化冲击力在改变其既有的、缓慢的进化模式，以服务于地方社群现代聚落文化诉求。



图 3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胞的生命历程

也正因为处于聚落文化的交替界面，因而可以从单个聚落案例的时空界面来观察不同基因胞所处的不同生命周期活动及其外部环境。当然，这种观察是对短暂景观横截面的判断，而非该传统聚落景观最终形式的判定。以中田村为例（图 3），民居群历史上峰值可达 800 多户，自 2012 年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中田村聚落核心区被停止拆建，至今保留有清至民国旧宅 100 余幢，但随着原有居民陆续搬离，如今仅有部分老人居住，居住人群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社区失去原有活力，基因胞的物质代谢、能量代谢与信息调控系统受损严重。

《宅经》有云：“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对于大部分住宅基因胞而言，因居住人群的离开，自然处于濒于衰老与凋亡的边缘。从断壁痕迹观察，显然有很多传统住宅基因胞已经凋亡多年。部分住宅基因胞经财政出资得以修缮，但其功能已悄然发生变化，文化遗产价值得以强调，现已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住宅基因胞的正堂仍摆放祖宗牌位，延续祭祖功能，有的被当作房祠堂使用。在潜在的旅游开发市场刺激下，仿古居住基因胞在中田村已初现端倪，影视文化的选景拍摄，对传统聚落的价值得以再认识。基因胞所蕴含的历史景观符号意义得以延续，传统基因胞的修复与再建或将对外部需求产生集体响应。

新出现的住宅基因胞环绕传统聚落原有基因胞而增殖，呈方盒型与道路垂直，其整体路网结构与建筑肌理更偏重功能性，新的基因胞更为坚固、结构设计弹性大、私密性强，结合电气化普及，胞内温度更趋于平衡，并基于宽敞的交通道路（类同神经细胞），融入更宏观、稳定、联系更为密切的社会文化治理体系之中。对于大多数传统聚落，在非外部干预情景下，随着原有基因胞代谢活力下降，逐步走向凋亡，而新出现的基因胞将逐步占据其空间，最终完成聚落景观的更替。

3.2.2 基因胞的增殖过程

基因胞同源增殖，有规律可循，相对明晰的地景脉络常见于基于血缘宗族式大屋的建造。南方大屋的建造过程有中心轴线可依，为多进式厅堂，然后向两侧及四周拓展，正如《礼记·曲礼下》有言：“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次之，居室为后”。而两翼延展所形成的主、次院落格局都极为相似，基本都由堂屋、天井及左右厢房等空间类型组成，各院落间通过巷道进行间隔与联系。院落间平面空间的相似性，反映的是宗族制度与聚居意识的统一性。

以张谷英村为例，聚落盆地四周环山，人居环境相对稳定，家族式宗法伦理严明，其基因胞的连接形式与院落基因胞样式，在时间序列上呈现高度一致性。自建立第一代屋“当大门”正堂屋开始，基因胞增殖与传承至今历经四个世纪，形成了当大门、王家墩、上新屋三组团所构成的“龙”图腾张氏聚落群。张氏大屋各布局均采取纵横向轴线，呈“干支式”结构，内部按照长幼划分“家支”用房^[35]，形成以祖（正）堂屋为场域中心的建筑与居住布局^[41]，于明清时期发展成熟^[42]，故其村落风貌为明清湘楚遗风，而其人口于今绵延二十六代。

景观基因胞作为聚落的有机单元，特别是以天井为中心的住居院落单元，最能体现这一长时间轴的增殖过程。以第二代屋王家墩聚点为例，正厅堂为先，住房围绕中轴线厅堂而建，随人口增殖，衍生出横堂，居住基因胞朝两侧横向不断延展，形成若干个天井围合院落，最终形成坐东北朝西南向的“丰”字形聚居格局（图 4）^[42]。而王家墩实际居住安排与干支式的拓展方式互为映射，即血缘性与居住空间邻近程度成正比，越靠西南与两侧走向的院落，其居住者血缘性离原始血缘越远，辈分更轻。这有利于宗族场域的形成，以及同支系、同辈分家庭间的日常沟通，合离恰到好处，结构稳定有序，浑然一体。家族制度的安排，使得基因胞随家族人口增殖而增殖，并实现原型式样的有效遗传，即居住文化的传承，纵使这一过程适应性地会嵌合更多的组合变体和基因胞类型。

3.2.3 基因胞的遗传过程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鲁克洪认为“文化是通过符号而获得并通过符号而传播的行为模式，这类模式有显性的和隐性的”^[43]。基因胞的遗传与变异是复杂的文化传播过程，以不同的表现形态或隐性含义进行变化，但其根本在于同源性，即“万

变不离其宗”。其中，基因胞的扩散是空间概念，但这种扩散需要历史事件的刺激与时间维度的叠加，才使得某类型基因胞在地域范围内产生可辨识的分布。“方形围合”是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形态的主体基因^[9]，形制起源久远，在原型基因胞扩散过程中，随附着基因的融入，会表现出适应性表型差异，即基因胞的变异过程。以研究范围内围合型天井式民居单元为例，在湘东北、东南均有分布，但平面格局与表型特征却存在差异，此现象是“方形围合型”民居基因胞地域扩散与变异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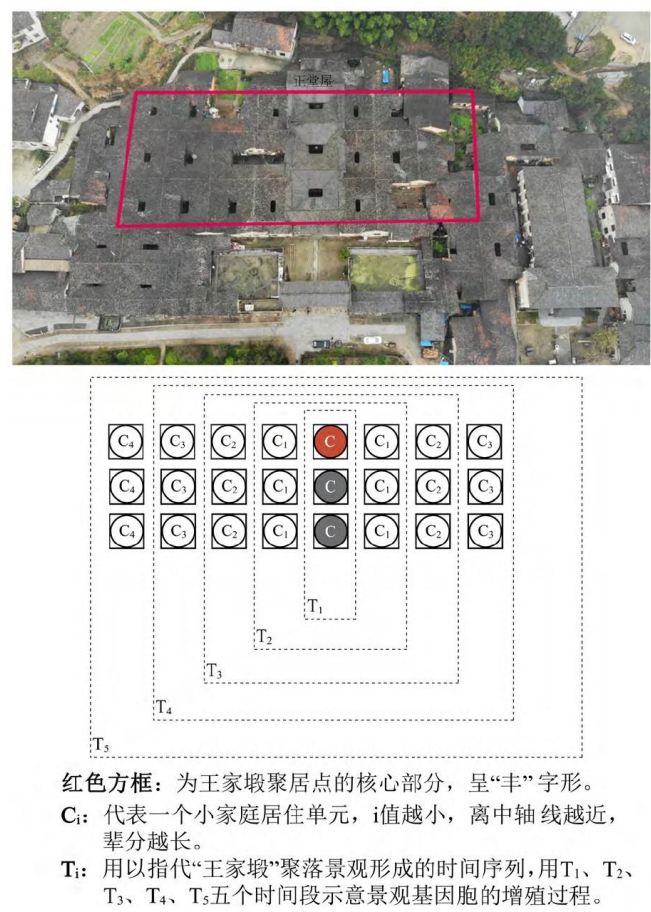


图 4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胞的增殖过程

从三个传统聚落的家族迁徙路径可知，区域案例聚落都直接或间接与中原文化相关，此与中心区向边缘区迁徙的史实吻合。房屋、天井、庭院构成的虚实居住空间多为方形嵌套的组合空间，是自然、文化与居住三者秩序的统一安排。其中，重要的空间单元放置在中轴线靠后的位置，基本上是厅或堂屋。从张谷英、中田以及上甘棠的住宅基因胞的平面形态与功能布局来看，在处理居住行为与自然环境及家庭伦理的关系上是高度统一的。屋顶斜坡倾入方形天井，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产生光、水、热、气的交互，而四周墙面围合形态用以确保居住的私密性与安全性，厅堂均位于中轴线上，宗法制得以体现（图 5b）。三个村落虽跨越多个地理纬度，存在外部环境的自然差异，但居住文化的内核却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因而，可以判定其为中土儒家文化住宅基因胞原型扩散的具体体现，是历史人群迁徙的集体记忆与心理沉积。

纵使案例基因胞展现出相似的精神世界与宗法制度，但在胞间连接方式及局部特征上却存在差异，使得基因胞迈向变异，此与基因胞的选择表达及环境适应相关。张谷英村属于南方大屋类型，各单元组织严密，浑然一体，天井与巷道连接，多个建筑群沿渭溪河共同构成“龙形”意象，使得住宅基因胞的胞间连接更为紧密。中田村的基因胞则以多进院落式住宅为主，外以露天巷道连接，巷道规整逼仄，路基设有槽孔，防御性强。上甘棠村则以谢沐河与外部相隔，按照街巷式布局，设立门坊，按“坊”居

住，有唐代里坊制度的遗风。在屋面及屋脸处理上，三者也表现出较大差异（图 5a、5c）。中田村与上甘棠村住宅基因胞外墙不开窗或开小窗（如中田村的箭窗），而张谷英古村选址隐蔽，少战乱^[44]，立面多有开大窗。中田村住宅基因胞屋面更是采取了无檐无廊的做法，四周完全被青砖包围，以防止被火攻。这些差异与村落所处环境相关，中田村在历史上处于瑶族对峙的湘南前沿阵地，上甘棠则深入瑶族世居地，“方形围合”院落向防御型变异上表现明显。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用生物学现象来类比传统聚落景观单元的综合特征，其目的在于从微观地理尺度探索传统地理观、传统居住方式及其时空规律三者的统一方式，也是关于农耕聚落景观基本物质单元产生、存在与发展的抽象化描述。综合性归纳与案例诠释为本文的重心，而非力图解释现象背后的机制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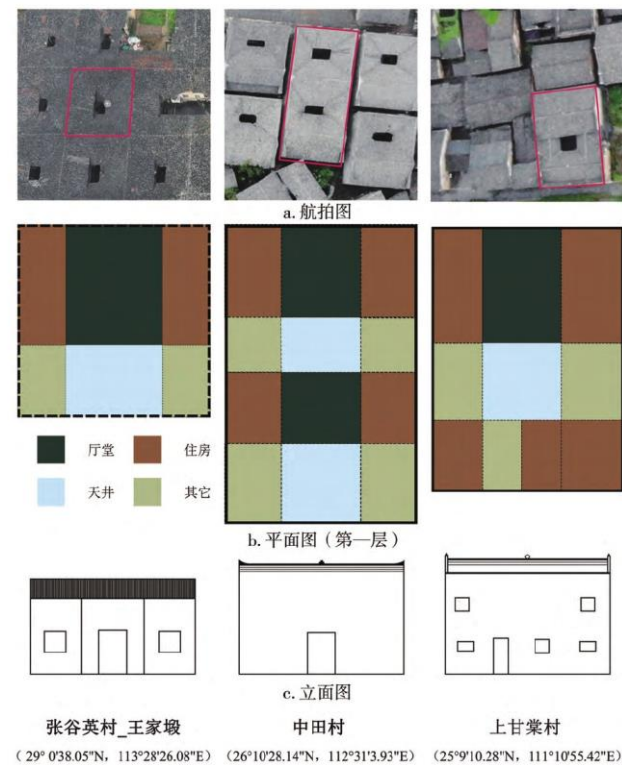


图 5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胞的扩散与分异

同时，这种类比并非是严格的。文化现象与生物现象都具有复杂性，其共通性因与生物基因类比的“模因”（meme）概念而广为传播^[45]，但其差异性同样需要被审视。生物细胞的遗传信息只能通过一分为二的分裂方式进行传递或扩散，而景观基因胞遗传信息的时空传递则包括了胞扩散、胞变异及胞恒定三种方式，生命周期特征也存在性质差异，其所属概念内涵也存在偏差。所以，类生命特征是一个较为宽松的综合概念。

简而言之，传统聚落景观基因胞的生物学特征主要包括类生命代谢活动，增殖与凋亡，以及遗传与变异三个侧面。这将有助于理解聚落景观的过去、当下及未来。

4.2 讨论

在当代时空界面中,对于传统聚落景观保护的情绪是复杂的,不同对象对传统乡村景观的文化解读与权益考量并不相同。但景观基因胞的自身规律性,似乎在表明,新旧交替,如何处理传统基因胞与新生基因胞的文化基因承接问题,才是症结所在。正如建筑学家梁思成指出,“中国建筑重用木材,乃出于中国人之性情,不求原物长存,服从自然生灭之定律,视建筑如被服舆马,安于兴亡交替及新陈代谢之理”^[46]。对传统聚落保护的出路或许在于对新生基因胞快速增殖所导致的地方文化景观无序性的审美反思,以及如何处理社会关系从血缘向业缘的转变过程中,景观基因胞连接方式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刘沛林. 风水: 中国人的环境观[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5:211.
- [2][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古代社会[M]. 杨东莼, 马雍, 马巨,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3]Vitor Oliveira. Teaching Urban Morphology[M]. Cham:Spring - 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2018.
- [4][德]沃尔特·克里斯塔勒. 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M]. 常正文, 王兴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5]侯璐璐, 刘云刚. 政治地理学中生存空间概念的演变[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5):637-647.
- [6]吴良镛. 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 [7][日]藤井明. 聚落探访[M]. 宁晶,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
- [8]Griffith T. Environment, village and city: A genetic approach to urban Geography (With some reference to possibilism)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42, 32(1):1-67.
- [9]刘沛林.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构建与应用研究[D]. 北京: 北京大学, 2011.
- [10]胡最, 刘沛林. 中国传统聚落景观基因组图谱特征[J]. 地理学报, 2015, 70(10):1592-1605.
- [11]李伯华, 曾荣倩, 刘沛林, 等. 基于 CAS 理论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化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18, 37(10):1982-1996.
- [12][英]康泽恩. 城镇平面格局分析: 诺森伯兰郡安尼克案例研究[M]. 宋峰, 许立言, 侯安阳, 等,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1.
- [13]吴良镛. 从“有机更新”走向新的“有机秩序”: 北京旧城居住区整治途径(二) [J]. 建筑学报, 1991(2):7-13.
- [14]王竹, 钱振澜. 乡村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理念与策略[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5, 30(2):15-19.
- [15]王会昌. 中国文化地理[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 [16]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17][美]易劳逸. 家族、土地与祖先: 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M]. 苑杰,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9.
- [18]邓辉. 卡尔·苏尔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与实践[J]. 地理研究, 2003, 22(5):625-634.
- [19]周婷. 湘西土家族建筑演变的适应性机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 [20]刘沛林. 家园的景观与基因: 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深层解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21][美]B. 艾伯茨, D. 布雷, K. 霍普金, 等. 细胞生物学精要[M]. 丁小燕, 陈跃磊, 徐沁, 等, 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 [22]Whittlesey D. Sequent Occupance[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29, 19(3):162-165.
- [23][美]阿摩斯·拉普卜特. 建成环境的意义——非言语表达方法[M]. 黄兰谷,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
- [24][美]施坚雅.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 史建云, 徐秀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25]刘沛林. 古村落文化景观的基因表达与景观识别[J].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3(4):1-8.
- [26][奥]埃尔温·薛定谔. 生命是什么[M]. 罗来鸥, 罗辽复, 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 [27]马炳坚. 中国古建筑的构造特点、损毁规律及保护修缮方法(上)[J]. 古建园林技术, 2006(3):57-62.
- [28]李晓峰. 两湖民居[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 [29]王其亨. 风水理论研究(第2版)[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05.
- [30]蔡曙山. 论数字化[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4):33-42, 203-204.
- [31]李伯华, 尹莎, 刘沛林, 等. 湖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 经济地理, 2015, 35(2):189-194.
- [32]柳肃. 营建的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建筑[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 [33]汪丽君. 建筑类型学(第3版)[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
- [34]张伟然. 试论湖南的历史文化区域[J]. 地理学报, 1995(1):59-66.
- [35]伍国正. 湘江流域传统民居及其文化审美研究[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
- [36]谭其骧. 湖南人由来考[C]//长水集(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 [37]宋巍. 湖南中田古村村落空间形态布局研究[D]. 长沙: 湖南大学, 2014.

-
- [38]李伯华,刘敏,刘沛林,等.景观基因信息链视角的传统村落风貌特征研究——以上甘棠村为例[J].人文地理,2020,35(4):40-47.
- [39]李旭,巫纪光.湖南省江永县上甘棠村聚落形态与氏族文化脉络[J].华中建筑,2009,27(8):234-237.
- [40][英]凯·安德森,[美]莫娜·多莫什,[英]史蒂夫·派尔,等.文化地理学手册[M].李蕾蕾,张景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41]刘锐.礼制、宗族、血缘与空间[D].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4.
- [42]殷素兰.张谷英村聚落景观形态发展形成机制研究[D].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4.
- [43]A.L.Kroeber,Clyde Kluckhohn.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M].Cambridge:Peabody Museum Press,1952.
- [44]张岳望.古村张谷英的风水格局与环境意象[J].中外建筑,2001(1):25-27.
- [45][英]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M].卢允中,张岱云,王兵,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 [46]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